

第七章 合浦与秦汉帝国的岭南边疆

苏秉琦指出，岭南“与一般的南方有所区别，……它南连着南洋诸岛、印度支那地区，是陆地一半海岛一半连成一片形成的一个大区，……是真正的南方”^[1]。合浦作为汉代岭南地区的次级行政中心和海陆交通要冲，合浦南越国遗存对把握环北部湾地区秦汉时期的社会文化发展和岭南地区秦汉时期的社会文化格局有着重要意义。本章将包括南越国墓葬在内的合浦汉代遗存置放在秦汉帝国岭南边疆的视野中，在岭南地区汉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讨论汉代合浦置郡的考古学背景，以及秦汉时期合浦及合浦郡的历史地位。

一、南越国遗存的文化属性

与其他边远地区有所差异，在岭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学研究中基本不见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命名。西汉前期岭南地区基本属于南越国的行政管辖范围，这一区域内的考古发现通常被称为南越国遗存。不过在南越国都城番禺以外的地区，考古遗存往往表现出某些地域性特征，学术界有时结合战国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族群分布冠以族称，如将以平乐银山岭墓地为代表的考古遗存称为西瓯文化，将以右江流域为代表的考古遗存称为骆越文化等，这类冠称其实属于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层面，在边远地区考古学研究中尤其有意义。南越国灭亡以后，岭南大部地区的汉代遗存一般被视为汉文化。

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史前时期有很大不同，有些学者赞成以族属或国别、朝代来命名，不过这容易引发研究中的混乱^[2]。更重要的是，发掘者和研究者对遗存族属的认识，未必就是历史的本原，不同研究者对遗存族属的认识可能会不一致。在岭南地区战国秦汉考古学研究中，还有依据个别显著的或主要的文化特征来冠称考古学文化的情况，如米字纹陶遗存。米字纹陶遗存类似于彩陶文化、细石器文化、曲刃青铜短剑文化等概念，这类概念在讨论某些特定问题、具体问题（如考古遗存分期编年、考古学文化因素流布等）有其便利之处，且约定俗成，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文化概念。

考古学研究的纵深推进，离不开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岭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命名是个值得提出来认真考虑的问题。同样是在属于百越地区的福建，即存在富林岗类型等考古学文化命名。有学者将富林岗类型的文化因素划分为汉、越两组，认为越文化因素是富林岗类型的主体，指出该类型就是闽越国前后受到汉化影响的闽越族物质文化，可能存在地域差别^[3]，这样的讨论对深入分析百越遗存的考古学文化结构和文化变迁自然便捷。事实上，越南北部东山文化及东山文化红河类型（塘瞿类型）、马江类型（东山类型）、嘎江类型（郎洼类型）等概念的确立，已经显示出

在岭南地区战国秦汉考古学研究中划分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必要性。

岭南地区的战国秦汉遗存已经显露出一些划分考古学文化类型的线索。如平乐银山岭西汉前期墓葬^[4]的陶器组合与封开利羊墩、广宁龙嘴岗等地有明显区别；揭东面头岭第四组二至四段墓葬^[5]的陶器组合与珠江三角洲等地有差别，原始瓷匚也很有特色；武鸣元龙坡墓地^[6]一方面与云南青铜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受到两广地区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代表着右江流域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的一支考古学文化类型。实际上先前已有学者建议将岭南地区的米字纹陶类型遗存命名为“西瓜岭文化”^[7]，总之，在考古学上提出若干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初步划分至少是值得论证的。

考古学文化也是多层次的。在一般意义的考古学文化、类型之上，还有诸如“区系”“文化系统”“同一谱系的诸考古文化”“文化圈”“历史文化区”等层次的划分^[8]。南越国占据岭南地区，实际自立，与汉王朝是“外臣”关系^[9]。两广地区已发表资料的南越国墓葬已经超过 600 座，还有番禺、南越国宫苑、秦汉造船场等城址、遗址的重要发现，南越国遗存在文化性质上不同于土著文化因素比较纯粹的百越遗存，也不同于南越国灭亡之后中原文化因素已经非常强烈的汉文化遗存，有必要将其视为一个考古学文化系统进行考察。

在《广州汉墓》收录的 182 座西汉前期墓中，不出 D 项陶器（鼎、盒、壶、钫）的墓葬约占 3/10，发掘报告认为墓主应是当地的土著民族——南越人^[10]。《西汉南越王墓》根据墓室构筑的不同和随葬品的差异，将南越国墓分为土著越人的墓葬和南下汉人与已汉化的越人的墓葬两类，前者主要发现于平乐银山岭墓地，还包括广州西村石头岗、下二望岗和柳园岗等地少数底铺小石或设腰坑并且不出土汉文化陶器、铜器的少量墓葬；后者与长沙汉初墓相同，基本上沿袭战国时期的楚墓制度^[11]。

南越国墓葬的文化因素构成大致有三种情况^[12]。其一，平乐银山岭、封开利羊墩等越文化因素比较纯粹的墓地，族属为土著越人；其二，广州汉墓西汉前期一些不出 D 项陶器的墓例、乐昌对面山等墓地越文化特征减退，汉文化因素亦不明显，墓主当为受到汉文化影响的土著越人；其三，广州汉墓西汉前期出有 D 项陶器的墓例普遍见有越式陶器，有的底铺河卵石，越文化因素亦较强烈，反映出南下汉人与汉化越人的族群身份在考古学上已经难于区分，这在象岗南越王墓、贵县罗泊湾汉墓、贺县金钟 M1 等王侯贵族墓葬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南越国境内有大量南下移民，所以任嚣称“番禺负山险阻，南北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13]。一方面中原移民不可避免地受到岭南越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土著越人逐渐汉化并开始使用汉式姓名，南越相吕嘉即是一例。贺县河东高寨 M4 出有“须甲”玉印和“如心”金印^[14]，研究者认为“‘如心’显系汉名，‘须甲’似为原来的越式名，如判断不误，则此墓死者应为已汉化的越人”^[15]。在南越国的实质性统治区域

内，土著越人日趋边缘化，在汉文化影响下逐渐发展为次生越人^[16]，并最终汉化。在以族群融合为主要表现的南越国社会文化的整合过程中，楚文化发挥了铺垫作用。

岭南地区战国墓以狭长形的土坑墓为基本特征^[17]，而南越国墓葬基本上改变了先秦越墓的传统形制，完全吸收了楚制并做了改进，占绝大多数的木椁墓大多分出头箱、边箱、棺室；随葬品除秦汉系统的器物 and 传统的越式器物外，大中型墓中多见楚式或仿楚式的鼎、壶、罍、盘等礼器，铜尊、铜镜和漆器多属楚文化系统^[18]。广州南越国后期墓葬趋于宏大复杂，汉式随葬品丰富，常见戳印职官或官署的陶文；大型墓随葬印章大多为汉名汉姓，墓主大多是南越国的官吏^[19]。这表明以番禺为中心，“一种新型的汉越融合的南越文化”^[20]已经形成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有学者将南越国成立后岭南越人与南迁汉人形成的民族融合体称为“南越族”^[21]，虽然不尽准确，但是也说明了这一历史趋势。

南越国深受秦汉文化浸淫，出土的木简木牍、玺印、封泥、陶文、金文、瓦当、石刻都使用汉字。南越国政治制度、百官制度、宫寝制度、陵墓制度以及度量衡制度^[22]等都以秦汉体制为基础并有所变易，如南越国宫苑遗址出土的木简“所见职官名称证实南越国官制‘同制京师’，但有个别职官如‘大鸡官’是南越国独有”^[23]；象岗南越王墓出土有四枚夫人玺印，“两汉朝庭尚未无以‘左’‘右’‘泰’‘部’（陪或副）命名夫人之例，可见这是南越国白创的制度”^[24]；岭南地区汉代城址没有发现“千秋万岁”瓦当，出土较多的却是“万岁”瓦当，“这是南越国即臣属于汉王朝，又保持相对独立的一个侧面反映”^[25]。

南越国实行“和集百越”的民族政策，赵佗本人“魑结箕踞”，自称“蛮夷大长老”，越相吕嘉“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26]，中原移民与汉化越人杂居共处，因此在考古学上强行凿分两类人群已不现实。南越国墓葬整体上可以视为汉越融合型遗存，就发展趋势而言甚或可以视为汉墓分布的一个地方类型。有学者注意到，长沙地区西汉中小型墓葬第三期的“器物组合中突然出现大量硬陶罐及一批南越国式釉陶器”，认为这种现象“恐与武帝收复岭南，恢复岭南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往这一历史事件有密切的关系”^[27]，有学者更直接地认为其与南越国灭亡后的人口迁移有关^[28]，从这个角度看，南越国遗存也对汉文化其他地方文化类型的发展发挥了作用。

岭南地区战国至西汉前期存在着越文化因素比较纯粹浓厚的土著遗存，这类遗存西汉中期以后在岭南的偏远地区仍然存在，可以称为百越考古学文化系统。汉武帝设置郡县后，岭南大部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趋于一致，之后共性更加明显，岭南地区西汉中期以后的考古遗存整体能够纳入汉文化系统。可以认为，岭南地区的百越文化系统在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其主体部分发展为南越国考古学文化系

统，而岭南地区西汉中期以后的汉文化系统则是在南越国文化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将南越国考古学文化系统与百越考古学文化系统和中原考古学文化系统区分开来，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把握南越国考古学文化的特质，进而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南越国时期社会文化的发展路径。

二、汉代合浦置郡的考古学背景

战国秦汉时期华南地区和东南地区为百越之地，当地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以几何印纹硬陶、有肩石器为特征，被认为与百越及其先民有关。苏秉琦这样概括岭南地区的先秦文化发展道路：“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夏、商、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距今两千多年前秦在岭南设郡的背景，其性质与秦并六国相同，是在其他条件业已具备的情况下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才能理解华南与包括南海诸岛在内广大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关系”^[29]。

按照《吕氏春秋》《山海经》《逸周书》等文献记载，岭南地区商周时期存在着一些土邦小国。有学者提出岭南古国的形成“至迟在青铜时代的第二阶段已经全面启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中心，不同的文化乃至不同的人们共同体有独特的标识”，“有些地区虽然尚没有发现重大的遗迹现象和特别精美的高等级器物，也完全可以根据考古学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推定古国的形成与否”，并列举出以番禺南沙、东莞村头、深圳屋背岭等商代遗址为代表的“绳纹古国”、以商代晚期至春秋晚期博罗横岭山墓地为代表的“夔纹古国”等一批古国遗存^[30]。

“战国时期岭南越文化较之前有较大变化，新的文化因素增多”，越人墓葬出现了底铺卵石或碎石、四角置人首或兽首柱形器等现象，圜底陶器锐减，逐渐流行瓮、罐等平底陶器，新出现了罐形鼎、越式鼎等三足陶器，“随葬铜容器增多，特别是战国‘越式鼎’已发展到鼎盛阶段，……青铜兵器的种类和数量也大增，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见有圆首有格剑和尊、鉴等吴越风格的铜兵器、铜礼器，而越式鼎原本流行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湘中、湘南地区，这种现象“大概是战国时期楚东灭吴、越，南控湘江流域，迫使江浙一带和湘江流域的越族大量迁往岭南所致”^[31]。

岭南地区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刺激因素之一是受楚文化的影响，广西桂东北等地春秋晚期至汉初墓葬出土的楚文物即达200余件^[32]。有学者认为战国中期以后楚国已经占领桂东北地区^[33]，战国时期楚国的南界已经进抵桂林附近的湘漓分水岭^[34]。不过楚文化对岭南地区的影响力度和影响方式尚有争论，有学者认为楚文化的实际影响力并未进入岭南地区，两个文化体系并未形成互动关系^[35]。虽然岭南腹地尚未发现典型楚式墓葬，而且有学者提出岭南东周越墓中的楚文化因素应该从湖南越人迁入的角度加以解释^[36]，不过春秋晚期以后岭南青铜器上确实见有楚文化

因素，“劳邑执割”和“朱庐执割”两方南越国印章更可以证明楚的政治势力曾经深入岭南地区^[37]，广州象岗南越王墓、贵县罗泊湾汉墓的“隔间”“椁箱”等所显示的楚式墓葬制度^[38]应该有其前期历史基础。

战国时期岭南地区的社会文化面貌发生较大变化的另一刺激因素是江浙越人向岭南地区的迁移。楚威王七年(公元前 333 年)“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39]。很多学者将此事件视为江浙地区越人向岭南迁移的历史背景。有学者根据铜镇等器物的线索^[40],推测“吴越人向岭南的迁徙过程至少从春秋晚期就已经开始,战国前期迁徙的规模更大”^[41]。近年来有学者注意到广州萝岗园岗山越人墓^[42]、合浦双坟墩^[43]、桂平大塘城 M3001^[44]、增城浮扶岭 M511^[45]等地土墩形态的坟丘与江浙地区土墩墓的联系,认为其中一些与江浙越人的迁移和文化传播有关^[46]。

岭南地区战国时期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人群和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影响。就出土青铜器分析,“广东中部和广西东北部地区春秋后期以来的铜器来源是多元的,湖南、吴越和当地土著三个方面铜器因素的有机结合共同铸造了本地高度的青铜文明,并将之推向一个高峰”^[47]。而楚、吴、越之间的战争,客观上影响了岭南地区的政治变化、人口迁移,战国后期的“王”字形符号青铜器与楚国势力的南扩和秦始皇灭楚、统一岭南发生着密切关系^[48]。在这些来自不同方向的迁徙人群和文化因素中,百越内部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江浙地区的吴越人群对岭南土著越人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楚文化的渗透则对战国时期岭南地区的社会变化起到了催化作用,并为秦汉文化人据岭南地区铺垫了基础。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49],成为岭南地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此时期中原文化的冲击力度骤然加大,岭南地区的社会形态发生重大变革,土著越人的文化属性也随之而发生转型,在考古学上表现为米字纹陶逐渐衰退,铁农工具、铁兵器和中原式板瓦、筒瓦、云纹瓦当等新文化因素开始传入岭南地区(参见第二章第二节)。不过就目前掌握的考古学材料而言,秦文化的影响力在物质文化层面表现得很微弱,几乎没有在岭南土著居民的文化底层得以反映。

南越国建立后,岭南地区成为西汉王朝中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社会文化单元,“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50]。南越国不仅占据岭南地区,并击败安阳王占领越南北部^[51],而且对福建地区的闽越国^[52]和云贵高原的西南夷^[53]也有影响力,云南楚雄万家坝 M23^[54]见有与广州汉墓相似的架棺方式^[55],称南越国势力范围“西至同师(云南保山)”并非虚言^[56]。在南越国治下,包括合浦在内的岭南地区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近百年的汉越融合型的社会文化发展轨迹奠定了岭南汉文化形成的基础。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合浦地区（及周边东兴、灵山、钦州等地）发现的先秦文化遗址即达 50 余处^[57]，文化内涵与桂南地区和粤西旧称南路地区的同期文化基本一致。商周时期，当地考古遗存以云雷纹陶器、夔纹陶器、米字纹陶器为主要特征，部分地点伴随有釉陶器、青铜器出现。有学者认为夔纹陶是自粤中地区溯西江而上流布至广西一带，米字纹陶器则是包括海路在内自华东地区向华南地区传播，最早在战国晚期出现在广西地区，合浦民间港口的形成亦当在此时^[58]。

有学者推测，“按一般情况来说，应先有合浦港，然后才有合浦郡县的设置。……合浦在设郡县之前理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为郡、县设置奠定了基础。合浦作为内河与海洋航运的结合点，在先秦时期就应该有了”^[59]，合浦近年来识别的南越国遗存证明了这一推断。《史记·货殖列传》称“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南朝盐田郡（治杜同县，今广西北海市）已设置盐场^[60]；宋代合浦白石、石康盐场生产的盐转运广西各埠集散^[61]；清人称廉州“府南滨大海，西距交趾，固两粤之藩篱，控蛮夷之襟要，珠官之富，盐池之饶，雄于南服”^[62]。可见渔盐之利也应该是合浦地区得以较早开发并设置郡县的经济背景。

南越国继承秦代的行政制度，一般认为仍然设置南海、桂林两郡，分象郡为交趾、九真两郡，并分封了苍梧秦王、西于王等王侯^[63]。秦桂林郡位于今广西中东部和广东西部，南越国时期拆分为桂林郡和苍梧秦王封地，分别成为西汉郁林郡、苍梧郡的行政基础；有些史料还提及南越国设有日南郡^[64]。若是如此，则在西汉设置的岭南七郡中，南海等六郡均大致本自南越国的郡国区划，惟合浦郡方向属于空白。象岗南越王墓出有“邻乡侯印”封泥，发掘报告认为“邻乡”为南越国自置郡名^[65]。根据西汉岭南七郡行政设置的地理格局及合浦南越国时期的考古发现，或许可以推测“邻乡”即是在合浦方位^[66]。有学者认为“朱庐、劳邑似均为秦桂林郡的属县，或南越国自置的县名”^[67]，或推测南越国在合浦地区设有羁縻性质的行政建置^[68]，可以说明汉代合浦置郡有行政基础。

西汉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秋，汉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击南越，元鼎六年冬（公元前 111 年）番禺城破，《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有“后汉遣伏波将军路博德讨越王。路将军至合浦”的记载，合浦地区此后被纳入西汉帝国的郡县体制。西汉中后期岭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合浦等地出现模仿中原地区砖室墓的带耳室木椁墓，随葬器物中的越式陶器基本消失，汉式铜器和陶模型明器开始流行。自此以后，包括合浦在内的岭南地区作为汉帝国边远地区的社会文化属性逐渐减弱，岭南地区的汉代考古学文化最终发展成为汉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

三、秦汉时期合浦及合浦郡的历史地位

南越国遗存研究是岭南地区秦汉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岭南地区西汉中期以后的考古学文化格局（参见附录《南越国遗存与岭南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格局》）。合浦南越国遗存与岭南地区秦汉遗存的研究内容交叉渗透，秦汉时期合浦郡的历史地位有必要在宏观背景下做整体考察。除第二章第一节对南越国遗存研究的总结概括外，岭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相关考古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岭南地区秦汉时期遗存的综合性研究。主要包括分期编年（参见第二章第一节）、文化变迁、区域综论以及与西南等地区的文化交流^[69]等方面。此外，有学者对包括岭南地区在内的汉代南方边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及所反映的汉代边疆治理模式进行讨论^[70]；有学者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在秦汉考古学综合研究基础上对华南地区社会历史进程进行论述^[71]。

(2) 秦汉时期城址和建筑研究。主要包括对城址年代、特征的分析 and 历史地理考证^[72]，建筑遗址、建筑材料和建筑模型明器研究^[73]及建筑史研究^[74]等。近年来，广西贵港贵城和武宣勒马汉代城址的田野考古工作获得重要成果，初步判断贵城城址与秦至南越国时期的桂林郡治和汉代郁林郡治有关，勒马城址为汉代中留（中溜）县治。此外，广西龙州庭城遗址出有弦纹瓦、绳纹板瓦、筒瓦及云树纹瓦当^[75]，该遗址与花山岩画点相距不远，意义重大。

(3) 岭南地区秦汉时期墓葬研究。岭南地区及包括岭南地区在内的秦汉时期墓葬研究主要依区域或分类型进行^[76]，论及墓葬形制、随葬器物、分期分区、文化因素分析、文化交流与区域互动等考古学基础研究内容。其他研究对夫妻合葬、厚葬、外藏椁、架棺、腰坑等丧葬习俗多有关注^[77]。

(4) 岭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遗存出土器物研究。战国秦汉时期铁器研究^[78]关联岭南地区的社会发展阶段和考古遗存的编年体系，尤其受到学术界重视（参见第二章第二节）。其他出土器物的研究涉及汉代青铜器、玻璃器、玉器、陶器、灯具、牌饰、印章、文字、戳印纹饰等^[79]，其中越式器物的研究集中于越式鼎、铜提筒、“王”字纹铜器、陶匏壶等^[80]，并有学者结合出土文物对汉代农业和手工业进行讨论（参见第二章第一节）。此外，《汉代的文物》^[81]和《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82]两部综合性专著均涉及岭南地区秦汉时期文物。

(5) 相关的岭南地区民族史和区域文化史研究。研究领域集中在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百越考古学文化及特征、汉越文化交流及民族融合，以及考古学所见岭南地区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等方面^[83]。

(6) 从考古学出发的海外交通史研究。岭南地区濒临中国南海，域内河网密布，江

海联运便捷，航运交通和海外交通史研究向来受到关注^[84]，对于番禺、徐闻、合浦等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及海外贸易产品的研究^[85]（参见第二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三节）亦有很多成果。

汉代合浦郡治存在两说。一说认为西汉合浦郡治位于徐闻，东汉时迁移至合浦；一说认为两汉时期合浦郡治均在合浦。根据文献考证及对徐闻、合浦地理环境、考古发现的整体考察，当以后说为是^[86]。经过南越国时期的发展，汉代合浦（今合浦）已经与南海郡的番禺（今广州）、桂林郡的布山（今贵港）并列为工商业都会^[87]。秦汉时期合浦及合浦郡的历史地位，可以从汉代合浦郡在岭南行政版图中的地理枢纽位置、合浦汉代遗存显现的岭南两大社会文化板块的过渡性特征、合浦与交趾地区的密切文化联系、合浦在岭南族群地理分布上的特殊空间区位，以及合浦在海外交通上的意义等方面加以考察。前文概括的岭南地区秦汉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显现或印证这些认识。

岭南地区秦汉时期的社会文化发展存在地域不平衡性，汉代郡县设置后逐渐形成包括南海、苍梧、郁林郡在内的东北板块和包括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四郡在内的西南板块^[88]。合浦郡在汉代岭南行政版图中居于地理枢纽位置，可以视为岭南地区两大社会文化板块的连接地带和过渡地带。合浦部分大中型西汉木椁墓的封护方式及出土的漆器、滑石器、簋形陶盒、灯具等受到楚文化影响^[89]；土墩墓为从江浙地区传入的吴越文化传统；文昌塔墓地出土的一字格铜剑（M33:1）是滇池和滇南—滇东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叠涩穹窿顶墓和出土的早期佛教文物、胡人俑等属于域外文化因素^[90]。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和合浦汉墓出土的各类海外舶来品及东汉徐闻令印^[91]、“西于”铭文铜铸^[92]等文物，以及马援自合浦“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93]而入交趾的记载，充分说明了汉代合浦郡四方辐辏的交通要枢地位。

合浦汉代考古遗存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岭南两大社会文化板块之间的过渡性状。以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以来的几何印纹硬陶传统为例，西汉时期的戳印纹硬陶主要分布在广东和广西东部，其中广西东部的平乐、贺州、贵港、合浦等地比较密集，而兴安、柳州、合浦一线以西罕见^[94]。合浦文昌塔^[95]、凤门岭^[96]、堂排^[97]、母猪岭^[98]、凸鬼岭^[99]等汉代墓地出土的戳印纹硬陶，即表现出当地兼具岭南两大社会文化板块分界线和连接点的双重内涵。在南越国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分区中，合浦所在的桂东南—粤西南区与桂东北—粤两区、桂西区之间存在较多文化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这一性状（参见第二章第四节和附录《南越国遗存与岭南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格局》）。

构成岭南地区汉代社会文化西南板块的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四郡主要处于环北部湾沿岸，合浦与交趾地区交通便利，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汉代合浦郡在西南

板块中发挥的连接地带作用尤其突出。西汉时期的路博德和东汉时期的马援征伐交趾均经行合浦，西汉晚期的合浦望牛岭 M1 出有朱书“九真府”和“九真府口器”的陶提筒^[100]，东汉时期的合浦风门岭土坑墓出有“西于”铭文铜铸。越南北部汉墓中同坟异穴合葬墓的出现可能首先是受到合浦汉墓的影响，E 型庭院等器物见于合浦东汉时期至三国初年墓葬^[101]。可以推测，越南北部汉墓普遍存在的岭南文化因素，以及贵港和岭南其他地区出土的具有越南境内汉墓风格的器物基本上是通过合浦流布的。

岭南地区在秦汉帝国版图中边远地区的社会文化属性比较显著，南越国需要从内地输入“金铁田器马牛羊”^[102]，合浦南越国墓葬出土铁器数量不多，文献中还有罪犯“徙合浦”的许多记载^[103]，边远属性更加强烈。西汉时期合浦郡户 15398、口 78980^[104]，东汉时期户 23121、口 86617^[105]，两汉时期合浦郡的人口变化似乎不大，不过随着南越国灭亡带来的南海郡的衰落^[106]，岭南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心有向西南板块转移的趋势。根据《汉书·地理志》的人口统计，交趾郡的人口数占岭南七郡的 60% 以上，其繁盛程度超出一般想象。广西东南部在西汉中期以后已经成为汉代篆刻花纹铜器的制作中心和主要产地”^[107]，青铜铸造业、玻璃烧制业和珍珠采集业都很发达^[108]，合浦西汉晚期至东汉墓葬中出有一些汉式姓名的印章^[109]，为征讨二征“光武乃诏长沙、合浦、交趾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110]。这些情况说明经过南越国和西汉郡县时期的社会整合，合浦的经济文化发展已经不能与前期同日而语，西汉时期屡见的“徙合浦”也就逐渐被东汉时期的“徙九真”“徙日南”所代替了^[111]。

“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112]在海南岛方向，汉代合浦郡属下朱卢县与朱崖县的关系及其地理位置长期存在争论，“朱庐执卦”银印只能够说明《汉志》中的朱卢不会是朱崖传写之讹。合浦郡朱卢县设置于西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 46 年）罢废珠崖郡之后，有学者认为朱卢县（朱崖县）一直设置在海南岛上，东汉时期海南岛仍然属于合浦郡管辖^[113]。不过海南岛上目前发现的汉代考古遗存不多，有学者指出海南岛零星报道的遗物“即使果然来自南越，也可能是民间的交往、易物而遗留下来的，与政治版图关系不大”，包括水波纹陶器在内的所谓“两汉遗存”并不可靠，其中的瓮棺葬实际是南朝至唐代的俚人遗存^[114]，地方史志记为西汉珠崖郡治址的珠崖岭城址经发掘判断为“唐代中、晚期所建”^[115]。无论朱卢县（朱崖县）是否在海南岛上，汉代合浦郡的辐射力远及海南岛确是事实，不过两汉政权实际掌控的范围应当极其有限。

合浦在岭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族群地理分布上处于比较特殊的空间区位。文献记载的岭南战国至西汉时期的越人集团主要是西瓯和骆越，实际还有南越，可能还有苍梧，宋人罗泌更在《路史》中列出越常、骆越、瓯越、西瓯、苍梧、杨穹、桂国、损子、产里、供人、北带、仆句、区吴等诸多百越支系。既往多认为西汉时期桂东南地区为西瓯、骆越杂居之地，不过也有属于西瓯聚居区的可能（参见第一章第二节）。

西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南越国的藩属政权，主要分布在郁江流域向南沿延伸至玉林方向的桂东南地区^[116]，合浦堂排M1^[117]出土的“劳邑执卦”琥珀印的印主，可能即是南越国封拜的越人部族首领，入汉后仍然为地方豪强^[118]。

东汉时期，岭南地区西南板块在族群关系、人文民俗等方面显现的土著特征仍然比较明显。东汉以来在粤西南和桂东南地区出现俚、蛮、乌浒等人群，这一带也是铜鼓出土最多的地方。文献中见有“合浦蛮里”^[119]“合浦蛮夷”^[120]“合浦、交阯乌浒蛮”^[121]等名称，其主体应该是西瓯、骆越后裔。俚、蛮、乌浒东汉屡叛，二征起事时“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122]，势力很强大。东吴时期俚人分布在“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123]；晋唐时期的俚人考古学文化以村落围沟、袋形坑、瓮棺葬、船形带腰坑土坑墓、北流型和灵山型铜鼓及内耳釜、提梁壶等陶器为主要特征^[124]。东吴设置合浦北部都尉、西晋置合浦属国都是为了重点掌控这一地区，刘宋泰始年间（465-471年）设置越州，治所位于今钦州浦北县越州故城，也表现出当地族群结构的特殊性。

百越地区面向海洋的地理环境，以及由此形成海洋性的经济文化类型和族群特性，与秦汉帝国的大陆性形成鲜明对比。岭南、东南地区沿海居民的社会人文属性表现在海洋渔猎生计、海船制作技术、航海交通习性、海上商业活动和海洋观念信仰等方面^[125]，这也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得以畅通的人文背景。“合浦是汉代对外交往的主要窗口和水路交通枢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以此为节点，向内陆及东南沿海延伸和辐射，海路贸易、沿海贸易和内陆贸易的网络交织在一起，奠定了合浦在汉代中西交往中的重要地位”^[126]，这段论述凝练地概括汉代合浦在海外交通史上的历史地位，进而可以充分诠释合浦汉代遗存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价值（参见第六章第三节）。

秦汉时期，中国与东南亚乃至更远地区的文化交流建立在三个基础背景之上。其一是百越族群的分布范围不仅局限于中国南方地域^[127]，铜鼓和靴形铜钺等文物在东南亚地区也有着广泛发现；其二是随着郡县制度在越南中北部的设立，秦汉文化以此为“桥头堡”向东南亚地区扩散渗透，其中包括金属农具和牛耕对东南亚稻作农业的深刻影响^[128]；其三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秦汉时期的合浦及合浦郡在这些基础背景中发挥了起承转合的重要作用。

岭南地区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分区格局与行政设置格局、族群分布格局大体对应。合浦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材料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岭南汉越融合型文化的海洋性特征，以及岭南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性；表现出考古学文化变迁与时代背景变化的同步性，以及岭南地区汉文化形成的阶段性。合浦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反映着“蛮荒”的“陆梁地”内化于秦汉王朝政治版图和文化版图的历史过程，在很大意义上也是百越地区融入“中华一体”历史进程的缩影^[129]。秦汉王朝在合浦地区的经略，对于中国历史边疆和现今领土疆域基础范围的形成有着重要贡献^[130]。

- [1] 苏秉琦:《岭南考古开题》,载杨式挺《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
- [2] 郑君雷:《文化人类学的族群认同与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思想战线》2007年第4期。
- [3] 吴春明:《闽江流域先秦两汉文化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95年第2期。
- [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 [5] 广东省博物馆、汕头市文管会、揭阳县博物馆:《广东揭阳县战国墓》,《考古》1992年第3期。
- [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鸣县文物管理所:《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 [7] 邱立诚:《论广东地区两周时期的考古文化》,载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
- [8] 郑君雷:《文化人类学的族群认同与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汉末魏晋河套阴山地区北方民族遗存族属研究的个案思考》,《思想战线》2007年第4期。
- [9] 刘瑞:《南越国非汉之诸侯国论》,载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等编《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5,第9-22页。
- [10]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上)》,文物出版社,1981,第457-458页。
- [11]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第354-355页。
- [12] 郑君雷:《俗化南夷——岭南秦汉时代汉文化形成的一个思考》,《华夏考古》2008年第3期。
- [13] [汉]班固:《汉书·南粤传》卷九十五,中华书局,1962,第3847页。
- [1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贺县文化局:《广西贺县河东高寨西汉墓》,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第29-45页。
- [15]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第355页。
- [16] 郑君雷:《俗化南夷——岭南秦汉时代汉文化形成的一个思考》,《华夏考古》2008年第3期。
- [17] 朱海仁:《岭南汉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与地域性》,载《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编《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第455-461页。
- [18] 高崇文:《试论岭南地区先秦至汉代考古学文化的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141-148页。
- [19]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第354-355页。
- [20] 全洪:《南越国铜镜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
- [21] 陈大远:《西江青铜文化与岭南部族文化的探讨》,《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
- [22]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第349-351页;张荣芳、黄森章:《南越国史》(修订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304-309页。
- [23] 黄展岳:《南越木简释文注释》,广州“西汉南越国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8。
- [24] 刘钊:《东南地区出土汉代陶玺石刻文字考证》,载邓聪、吴春明主编《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第216-223页。
- [25] 李灶新:《广东出土秦汉瓦当初步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105-118页。
- [26] [汉]班固:《汉书·南粤传》卷九十五,中华书局,1962,第3855页。
- [27] 宋少华:《西汉长沙国(临湘)中小型墓葬分期概论》,载何介钧主编《考古耕耘录:湖南省中青年考古学者论文选集》,岳麓书社,1999。

- [28] 刘瑞:《禁锢与脱困——汉南海郡诸问题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254-272页。
- [29]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92页。
- [30] 卜正:《岭南文明进程的考古学观察》,《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三卷第二期,2005。
- [31] 高崇文:《试论岭南地区先秦至汉代考古学文化的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141-148页。
- [32] 蒋廷瑜、蓝日勇:《广西出土的楚文物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1986年第4期。
- [33] 黄展岳:《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 [34] 蒋廷瑜:《楚国的南界和楚文化对岭南的影响》,载中国考古学会编辑《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0》,文物出版社,1982,第67-73页。
- [35] 祝诣博:《楚与两广越文化初探》,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第512-518页。
- [36] 李龙章:《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第294页。
- [37] 郑君雷:《汉印与岭南汉代史迹》,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232-243页。
- [38] 王学理:《南越王墓“外藏椁”设置之我见》,载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等编《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5,第77-85页。
- [39] [汉]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卷四十一,中华书局,1959,1751页。
- [40] 郑小炉:《东南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镇”——古越族向岭南迁徙的一个例证》,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4,第195-204页。
- [41] 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第232-236页。
- [42]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萝岗区园岗山越人墓发掘简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华南考古2》,文物出版社,2008,第254-262页。
- [43]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县双坟墩土墩墓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4期。
- [44]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桂平市博物馆:《桂平大塘城遗址汉墓发掘报告》,载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西考古文集(第4辑)》,科学出版社,2010,第213-254页。
- [45] 张强禄:《增城浮扶岭M511再研究》,《文博学刊》2020年第1期。
- [46] 富霞、熊昭明:《从广西发现的土墩墓看越人南迁》,《考古》2016年第8期。
- [47] 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第232页。
- [48] 徐桓彬:《论岭南出土的“王”字形符号青铜器》,载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
- [49] [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中华书局,1959,第253页。
- [50] [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中华书局,1959,第2994页。
- [51] [北魏]酈道元、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卷三七,中华书局,2007,第861页。
- [52] [汉]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卷一一三,中华书局,1959,第2969页。
- [53] [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中华书局,1959,第2994页。
- [54]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 [55] 郑君雷:《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架棺”葬俗》,《考古》2012年第3期。
- [56] 郑君雷:《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考古人类学考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 [57]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南路地区原始文化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
- [58] 邱立诚:《合浦——历史的选择》,载《粤地考古求索——邱立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第445-455页。
- [59] 蒋廷瑜:《汉代合浦及其海上交通的几个问题》,载《桂岭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第199-207页。

- [60] 吉成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盐生产》,《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2期。
- [61] 柯佩琤:《对〈岭外代答〉一处失误的辨证》,《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4期。
- [62]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百四《广东》,中华书局,2005,第4753页。
- [63] 张荣芳、黄森章:《南越国史》(修订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3-121页。
- [64] [清]黎崱:《安南志略》卷四,第8页。引《交州记》:“是时越自全,三侯牵牛酒千钟,持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户籍迎降,路博德因拜三者为三郡守。雒王、雒将治民如故。”
- [65]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第310页。
- [66] 郑君雷:《汉印与岭南汉代史迹》,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232-243页。
- [67] 全洪:《试从考古资料看南朝海南岛重置郡县问题》,载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第10页。
- [68] 郑君雷:《汉印与岭南汉代史迹》,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232-243页。
- [69] 赵善德:《广东先秦文化与秦汉文化的比较研究》,《岭南文史》2001年第2期;高崇文:《试论岭南地区先秦至汉代考古学文化的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141-148页;朱海仁:《香港汉代考古发现与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42-62页;肖明华:《粤桂滇黔地区汉代文化中的相似因素》,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206-217页;罗二虎、李晓:《论汉代岭南与巴蜀地区的文化交流——以双层木椁墓为中心的考古学观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218-232页。
- [70] [美国]安赋诗著,赵德云译:《边疆和边界:汉帝国的南部边陲》,载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南方民族考古(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10,第151-162页。
- [71] 刘瑞:《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以考古视角的审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 [72] 李珍、覃玉东:《广西汉代城址初探》,载广西博物馆编《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二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第43-50页;熊昭明:《广西的汉代城址与初步认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汉长安城与汉文化——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蒋廷瑜:《试从考古发现探寻汉晋广信县治的地理位置》,载《桂岭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第266-272页。
- [73] 邱立诚:《广东秦汉时期建筑遗址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邱立诚:《粤闽地区汉代建筑遗址的研究》,《广东文物》1998年第2期;李灶新:《广东出土秦汉瓦当初步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105-118页;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出土汉代陶屋》,文物出版社,1958;林强:《广西汉代陶屋初探》,《广西文物》1992年第3-4期合刊;冯远:《汉代岭南地区建筑明器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 [74] 陈泽泓:《秦汉岭南建筑简论》,载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七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67-82页;曹劲:《先秦两汉岭南建筑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
- [75] 崇左市龙州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龙州篇)》,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第110、113-117页。
- [76] 陈文:《广西汉墓形制初探》,载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编《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第286-300页;李龙章:《广西右江流域战国秦汉墓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余静:《中国南方地区两汉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居方方:《岭南地区西汉中小型墓葬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张仁杰:《广州地区汉墓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刘瑞:《华南秦汉土坑墓研究》,《考古学集刊19》,科学出版社,2013,第113-204页;王彤:《岭南汉墓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富霞:《合浦汉墓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 [77] 蒋廷瑜:《汉代同坟异穴夫妻合葬墓浅议》,《南方文物》1993年第1期;林强:《岭南汉代夫妻合葬墓

有关问题的探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林强：《广西汉代厚葬习俗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谢广维：《广西汉代“外藏椁”初探》，载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纪念广西考古七十周年专集》，科学出版社，2006，第506-518页；谢日万：《论两广战国汉代墓的腰坑习俗》，《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莫志东：《试论两广地区腰坑墓的族属及其文化特征——炎帝后裔苍梧部落南迁两广》，载霍彦儒主编《炎帝与汉民族论集》，三秦出版社，2003，第77-85页；洪德善：《岭南腰坑葬及其族属研究》，《四川文物》2010年第4期；朱海仁：《岭南腰坑墓探源》，《中国文物报》2004年8月20日；郑君雷：《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柱洞”》，《四川文物》2010年第4期。

[78] 杨式挺：《关于广东早期铁器的若干问题》，《考古》1977年第2期；蓝日勇：《广西战国铁器初探》，《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李龙章：《两广地区出土战国秦汉铁器辨析（上）》，载深圳博物馆编《深圳文博论丛·二〇一〇年》，文物出版社，2010，第47-58页；李龙章：《两广地区出土战国秦汉铁器辨析（中）》，载深圳博物馆编《深圳文博论丛·二〇一一年》，文物出版社，2011，第108-130页；李龙章：《两广地区出土战国秦汉铁器辨析（下）》，载深圳博物馆编《深圳文博论丛·二〇一二年》，文物出版社，2012；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第313-318页。

[79] 朱海仁：《岭南汉墓仿铜陶礼器的考察》，载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博物馆编《华南考古1》，文物出版社，2004，第113-121页；周繁文：《秦汉时期岭南联体陶器研究——以五联罐为主》，《东南文化》2018年第6期；黄展岳：《关于两广出土北方动物纹牌饰问题》，《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2期；杨其民：《长沙西汉“陆暴尉印”应为“陆梁尉印”》，《考古》1979年第4期；王人聪：《西汉越族官印试释》，《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李光军：《两广出土西汉器物铭文官名考》，《文博》1987年第3期；富霞：《广西出土的汉代文字》，载广西民族博物馆编《民博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第91-100页；张倩：《汉代岭南硬陶戳印纹饰的初步研究》，《文博》2017年第6期。

[80] 叶文宪：《越式鼎溯源》，《东南文化》1988年第6期；黄展岳：《铜提筒考略》，《考古》1989年第9期；傅聚良：《湖广地区出土的“王”字铜器》，《文物》2003年第1期；徐桓彬：《论岭南出土的“王”字形符号青铜器》，载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第131-143页；曾凡：《关于“陶匏壶”问题》，《考古》1990年第9期；梅华全：《论福建及两广地区出土的陶匏壶》，《考古》1989年第11期。

[81] [日本]林已奈夫：《汉代の文物》，朋友书店，1996。

[82]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

[83] 梅华全：《百越民族墓葬综述》，载王懿之、李景煜主编《百越史论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第418-430页；蓝日勇：《汉代广西越文化特点简论》，《广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3期；刘瑞：《华南秦汉越人“窄坑墓”》，载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编《西部考古（第8辑）》，科学出版社，2015，第118-132页；梁旭达：《论秦汉时期岭南越人和汉族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贵州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朱海仁：《岭南汉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与地域性》，载《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编《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第455-461页；郑君雷：《俗化南夷——岭南秦汉时代汉文化形成的一个思考》，《华夏考古》2008年第3期；吴俊：《秦汉时期广西地区汉文化研究：以考古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郑君雷：《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考古人类学考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84] 麦英豪：《汉代番禺的水上交通与考古发现》，《广州文博》1987年第4期；黄展岳：《广州汉代考古与海交史研究》，《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2期；赵善德：《论广东先秦秦汉的航运》，载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华南考古1》，文物出版社，2004，第89-99页；李庆新：《从考古发现看秦汉六朝时期的岭南与南海交通》，《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

[85] 陈佳荣：《西汉南海远航之始发点》，载广东省博物馆编《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9》，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238-243页；全洪：《关于汉代徐闻港的若干问题》，载《岭南考古研究（第二辑）》，岭南美术出版社，2002，第228-234页；崔勇：《徐闻二桥村汉代遗址与汉代徐闻港的关系》，《岭南文史》2000年第4期；全洪：《广州出土海上丝绸之路遗物源流初探》，载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

- 博物馆编《华南考古1》，文物出版社，2004，第138-146页；熊昭明：《汉代合浦港口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2015；李青会、左骏、刘琦等：《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汉代合浦港》，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 [86] 梁旭达、邓兰：《汉代合浦郡与海上丝绸之路》，《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蒋廷瑜：《汉代合浦及其海上交通的几个问题》，载《桂岭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第199-208页。
- [87] 蒋廷瑜：《汉代篆刻花纹铜器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3期。
- [88] 郑君雷：《岭南汉城与西汉时期岭南汉文化的形成》，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科学古籍出版社，2019，第219-231页。
- [89] 富霞：《合浦汉墓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第173-174页；高成林：《岭南地区汉墓出土簠形盒渊源试探——从簠形盒看楚文化对岭南地区的影响》，载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第683-697页；熊昭明：《广西汉代出土灯具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
- [90] 富霞：《合浦汉墓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第176页。
- [91] 蒋廷瑜、王伟昭：《黄泥岗1号墓和“徐闻令印”考》，载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第214-216页。
- [9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县风门岭、望牛岭汉墓》，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第190页。
- [93] [南朝]范晔：《后汉书·马援传》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65，第838页。
- [94] 张倩：《汉代岭南硬陶戳印纹饰的初步研究》，《文博》2017年第6期。
- [95]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合浦县博物馆：《2005年合浦县文昌塔汉墓发掘报告》，载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文物出版社，2007，第101-131页。
- [9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
- [9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第46-56页。
- [98] 广西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母猪岭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5期。
- [99]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凸鬼岭清理两座汉墓》，载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1950-1990》，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431-438页。
- [100]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
- [101] 韦伟燕：《越南境内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第230-239页。
- [102] [汉]班固：《汉书·南粤传》卷九十五，中华书局，1962，第3851页。
- [103] 蒋廷瑜：《再论汉代罪犯流徙合浦的问题》，《桂岭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第208-214页。
- [104]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中华书局，1962，第1630页。
- [105] [南朝]范晔：《后汉书·郡国志》第二十三，中华书局，1965，第3531页。
- [106] 刘瑞：《禁锢与脱困——汉南海郡诸问题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254-272页。
- [107] 蒋廷瑜：《汉代篆刻花纹铜器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3期。
- [108] 蒋廷瑜：《再论汉代罪犯流徙合浦的问题》，载《桂岭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第208-214页。
- [109] 富霞：《合浦汉墓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第200页。
- [110] [南朝]范晔：《后汉书·南蛮传》卷八十六，中华书局，1965，第2836页。
- [111] 蒋廷瑜：《再论汉代罪犯流徙合浦的问题》，载《桂岭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第208-214页。
- [112]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中华书局，1962，第1670页。
- [113] 杨武泉：《西汉晚期至萧齐海南岛不在大陆王朝版图之外——与谭其骧先生商榷》，《历史研究》1989

年第6期。

[114] 全洪：《试从考古资料看南朝海南岛重置郡县问题》，载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编《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

[115] 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琼山市文化广电体育局：《海南琼山市珠崖岭古城址1999年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4期。

[116] 郑君雷：《西瓯、苍梧与南越》，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263-272页。

[11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第46-56页。

[118] 郑君雷：《汉印与岭南汉代史迹》，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232-243页。

[119] [南朝]范晔：《后汉书·南蛮传》卷八十六，中华书局，1965，第2836页。

[120] [南朝]范晔：《后汉书·孝安帝纪》卷五，中华书局，1965，第226页。

[121] [南朝]范晔：《后汉书·孝灵帝纪》卷八，中华书局，1965，第340页。

[122] [南朝]范晔：《后汉书·南蛮传》卷八十六，中华书局，1965，第2836页。

[123]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七八五，《四夷·俚》，中华书局，1960年，第3478页。

[124] 冯孟钦：《广东俚人遗存的考古学观察》，载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等编《百越研究（第一辑）——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第219-230页。

[125] 蓝达居：《百越海洋人文与福建区域人文模式》，载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等编《百越研究（第一辑）——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第45-61页。

[126] 熊昭明、韦莉果：《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第73页。

[127] 李昆声：《亚洲稻作农业的起源》，《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

[128] 朱宏斌：《秦汉时期传统稻作农业科技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东南亚纵横》2002年第11期。

[129] 郑君雷：《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考古人类学观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130] 郑君雷：《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模式》，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续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1-5页。